

学生是高校工作的目的,而非载体。行政手段虽有边界,育人却是永无止境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赋予高校育人的丰厚营养,而起点就是改变师生的“主体间性”,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组成的高校变成“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营造育人环境,追求育人目标。

高校学生管理“边界”何在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图片来源:全景网

近日,西安翻译学院发布《关于严禁学生在校期间饮酒的规定(试行)》,严禁学生在校内外组织的聚餐活动中饮酒;严禁教职工和学生饮酒;饮酒或酒后滋事被处分的学生,最严重的将会被开除学籍。

对此,不少人认为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校园里因为喝酒出的事太多了,但也有人质疑学校“管得过宽”,认为喝酒与否属于学生个人自由,毕竟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并且校方不该将“管理延伸至校外”。

那么,到底是理应当如此还是管得过宽?对于高校学生管理来说,“边界”究竟在哪里?

正常冲突

实际上,该校“禁酒令”并非孤例。

早在今年3月,云南艺术学院就曾出台一则禁止学生饮酒的规定,称“一经发现,学校将你醉酒后的照片用邮政特快的传递方式送你父母”。在高校里,其他类似的针对学生管理的规定还有很多。比如,禁止学生在特定时间滞留宿舍和在床上睡觉;禁止学生叫外卖,违者断电三天等。

无论上述哪种规定,都无一例外地引来反对者对于高校“管得过宽”的质疑。

而与之相对,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曾发生了一件貌似“管得过窄”的事,几名女生借口“不忍浪费山城的好时光”和校规规定不可以打麻将,带着月饼在校园内赏月、打麻将,直到凌晨3点,保安巡查经过时才停止。最后,该校校长也只是撰文指出,同学打牌虽没对师生造成重大滋扰,但或有欠读书人应有的礼貌,且会伤害中大人的感情,以此作罢。

不管高校管得过宽还是过窄,都体现出学校管理权与学生自主权之间的一种冲突。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微观层面上,“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价值观、利益等不同,学校管理权限过宽,自然就会让学生自主管理的权限缩窄”。

其实很多时候,高校不得不管得多一些。因为在办学过程中,高校确实存在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在一些学生个体行为导致的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客观存在维护校园正常秩序的压力。南开大学学工部部长白云龙说。

但实际上,这样又很容易产生一种悖论:高校遵循教育规律,让学生自由发展,家长和社会埋怨高校没有尽到责任;高校响应家长和社会的需要,勉为其难出手管了,学生又反过来抱怨不自由,社会上又有人批评高校行为“不现代”。

“这让大学如何何处呢?”言谈中,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透露出高校的无奈。

无奈之举

事实上,这种无奈也正是高校出台相关规定的出发点。

一般来说,大学生已经成年,高校应该给予其个人发展更大的自由度。“但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客观现实仍然是注重智育,轻视性格和习惯的养成,美育素养和能力的发展也非常不足。”张端鸿说,即便是在重点大学,也有数量众多的学生不知道如何管理时间,合理约束个人行为,就更不必说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了,“很多高校教师开玩笑说,基础教育给高校输送了一大批‘不合格’的大学生”。

而在白云龙看来,面对这种现实无奈,除了一纸禁令,更需要全社会的理性回答。因此,高校发布“禁酒令”,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因为一些学生酒后失控、呕吐、寻衅滋事;不允许学生在特定时间滞留宿舍,是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因为不少学生在游戏时间、睡眠上控制不当。

“如果我们对于‘成功’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分数’‘权贵’‘金钱’层面,甚至认为一些必要的素质和修养并不会成为孩子未来人生的决定性因素,迷信于‘大德无亏,小节不必拘也’,那么,不论多大岁数的人,不都是一个‘熊孩子’。”他指出,我们不必急于指责规定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而是要冷静分析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忍受人人追求权利边界扩张?而不谈任何义务和担当。

短视行为

此外,白云龙并不觉得高校存在“管得过宽”的问题。

他认为,高校是立德树人之所,教育引导学生养成有利身心健康发展的习惯,本就是育人

的职责所在。“不过,对于是否一定要用‘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倒是值得推敲的。”

“‘学则’是学校的法律,是学生行为的底线伦理约束,而道德属于高线伦理。”白云龙表示,管理学生应该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如同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以德治国一样,这一办学治校的理念应该融入学生成长教育的点点滴滴,而不是意图通过禁令“一规了之”。

对于这些规定的出台,张端鸿与操太圣分别表达了反对意见。

“高校的做法是可以理解、情有可原的,而且也回应了部分家长和社会的需要,但这并不利于让大学生以成年人的姿态‘断奶’。”张端鸿说,“而且,哪里有问题就抓哪里,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他指出,现代高校学生管理不是替代家长,对于某些不良生活习惯,可引导学生自主订立学生公约,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作用。高校需要采取根本的措施保障教师安心从教,学生专注学习,形成优良的教风和学风,而强行规定教师不“分心走穴”,学生不“沉迷游戏”,不仅缺乏有效性,也会引起师生的反感。

操太圣也表示,虽然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被“圈养”,自我管理能力弱,但这并不能成为大学继续采取像基础教育阶段那样把学生事无巨细地管起来的理由。

他说,上述规定反映出高校对学生的不信任及其自身工作的不专业。作为专业的教育机构,高校不能把问题透过于学生,而应更多考虑如何创设有利的环境,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在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学校治理、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的背景下,这些规定仅仅将学生视为看管对象,其理念与做法也显得保守而陈旧。”

“大学这样做是一种短视行为。”操太圣警醒道,高校的专业性在于帮助学生走向成熟,而不放手的结果是将前期教育后遗症的解决进程继续延后,最终与高校设定的培养目标相违背。

何为边界

那么,既然不应出台这些具体禁令,高校又该如何实施学生管理呢?

在白云龙看来,其实并没有具体的“边界”可言,但首先需要明确行政和育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学生是高校工作的目的,而非载体。行政手段虽有边界,育人却是永无止境的。”他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赋予高校育人的丰厚营养,而起点就是改变师生的“主体间性”,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组成的高校变成“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营造育人环境,追求育人目标。

在此基础上,要依法治校、以德治学;对于公序良俗,可以通过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来落细落小,引领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必须告诫学生,每一个人都享有支配自己身心的权利,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动辄轻言个人维权,对权力边界予以划分,实质上是对学校行政权力的抵触,而忽视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重要法则的公然蔑视。

“因此,有违公众利益,或对公众利益构成潜在伤害的行为,都要管起来。”白云龙说,关键是要辨析“什么是学校行政权力的边界”,作为制度安排,“行政权力的育人效力而非约束效力该如何评价”,如果效力评价结果低于预期,则应当审慎决策。

具体来说,就是要结合学校主客观环境,考虑更新效力评价要素,选择育人而非管人,并选择更加有效的方式,比如通过学生会创立“学生公约”,由学生群体认定行为失范“负面清单”,并在奖学金、助学金等评比中行使否决权。“这既是对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公共权利的尊重,也是学生参与学校日常工作、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渠道。”

而在张端鸿看来,高校实施学生管理,首先要基于大学生是成年人这一前提。

学校培养部门和院系要严格落实学术标准,鼓励、激励和要求大学教师多投入教学,多跟学生互动,将学生自然“卷入”学习过程;学生管理部门要转变角色,不仅要管思想、管生活,也要用开放的心态,加强与教学管理部门的合作,在学业支持、学业促进等方面加强两者之间的合作。

对此,操太圣也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在观念上,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尤其是在事关其本身利益的重大事项上,让其有能力、有机会参与讨论和决策。”操太圣说,在制度上,高校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谨慎出台学生管理规定,既注意体现多元治理理念,又要聚焦在学生成长的根本目标上。

中国大学评论

农村中学需要高校特别关注

卢晓东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城乡比较的研究维度上,一些以前未经注意的现象被发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蒋承教授及其团队发现,目前全国高中学生每周学习时间非常长,全国城乡平均达到75.8小时,但农村学生更长,平均达到77.5小时。因为学习时间太长,学生每周自由阅读、锻炼身体、劳动以及与父母、朋友沟通和交流的时间被大幅度压缩。

然而,在学生学习时间更长的情况下,农村高中教育的质量如何呢?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农村高中教育质量在相对下降。相对下降的第一个表征,就是在高考试题城乡一致的前提下,能够考上一流高校的农村生源比例越来越少。笔者的学生于晓磊和笔者的合作研究发现,一所“985工程”高校中,2004-2009年六年间,该校农村户籍学生比例在10%~15%之间徘徊,与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相比,农村学生考入这所大学的机会很小,必须通过国家专项招生计划才能保证基本的城乡公平。农村高中教育质量下降的第二个表征,就是学生入学后,农村学生群体在大学的学业表现大幅度落后于城镇学生群体,这一差异在大学一年级就十分显著,到本科毕业时也难以消除。基础教育质量的城乡差异似乎正在大学中延续。

在以上背景下,农村高中教育似乎陷入了一个认知的死胡同,陷入了恶性循环。教师逼着学生学,学生的学习时间越来越长,有些农村中学采用军事化管理,严格控制学生的上厕所时间、吃饭时间,学生在本质上成为了学校的“囚徒”,成了教师完成高考任务的工具,成了地方领导完成高考成绩的工具,学生丧失了主体性,丧失了自由和存在。他们毕业后用集体撕书来庆祝自由的重新获得。这样的学生又如何能在大学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如何能够在大学积极主动地投入更加紧张严肃同时更加自由的学习生活中?本质上,这样的应试教育束缚了学生,束缚了教师和校长,其教学效果短期和长期都已经过实证研究,证明越来越不好,但似乎少有农村中学能够从这样的办学模式中退出来。地方政府将高考成绩作为政绩插手办学,办学者也丧失了自由,无暇对这样的办学及其未来有所深思。这是教育观念的误区和陷阱,很可能是农村高中教育改革的核心所在。

《光明日报》(2018年8月11日)曾以“为孩子起飞蓄能”为题,报道了一所农村中学——湖南桃源一中的教育改革和实践。这所农村中学在走另外一条路,因而在上述农村中学办学模式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校长燕立园经由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思考,直觉地把握住了素质教育的本质,跨过一些“真相”(指并非真实的“现象”)而关注到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关注到主体得以确立后的自由和自立。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燕立园注意到,不是教师讲得多教学效果就好,不是教师把所有疑问都回答了,教学效果就好,而是让学生自己思考,自己做题,自己总结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燕立园形象地将这样的教学方法称为“排骨理论”,就是由浅入深,让学生自己去吃。将“排骨理论”推广和深化,就是把学生原本的权力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本能和学习动机。因此,桃源一中的课堂注重四个权力的下放,一是思维权(想)下放,让学生自己想出更多的解题思路,更多地彼此交流,这是一种注重存在之交流,注重学生主体权力的“同辈学习”(peer learning)模式;二是动手权(做)下放,学生自己动手做出来了,将思维变成了现实,这也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做中学”模式;三是话语权(说)下放,给予学生更多的表达机会,让学生在表达中学习和熟练从容的表达、逻辑清晰的表达;四是归纳总结权(分析后综合)下放,让学生自己总结,这四个环节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学生成为学习和生活的主体,取得了很好的育人效果。

当然,学生主体性的确立,必然意味着学生自由学习时间的增加,意味着桃源一中明确反对时间的控制,明确反对刷题,明确反对唯分数论。这既是素质教育思想实践的结果,也是素质教育思想实践的前提。

复旦大学陆一研究员曾有一句名言,就是“素质教育不是吹拉弹唱”,这个概括十分形象。如果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吹拉弹唱”,农村中学就需要开出很多“吹拉弹唱”的课程,但这样丰富多彩的课程,师资是农村中学财力、办学条件方面难以负担的。如果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吹拉弹唱”,那么这样的定义一开始就把农村中学排除在了素质教育大门之外。

素质教育的本质确实不是“吹拉弹唱”,而是尊重学生,给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时间和空间,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帮助学生确立其主体性,使得学生得以探索自我的存在,自我发现、自我学习,这才是素质教育的本质。湖南桃源一中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素质教育在农村中学是可行的,这样的素质教育不是机械的“训练”,这样的素质教育才会有更好的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这样的素质教育是农村中学另一条教育改革的方向。

农村中学这样与众不同的教育实践值得高校特别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

为学生打开创造世界的大门

■本报记者 王之康 通讯员 马超

数百年来,人类通过化学认识了物质的组成、性质、结构与变化规律。就像瑞典化学家舍勒所说,对于化学家而言,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发现世人从未见过的新物质”。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周其林有着深刻感受。

“化学能够创造出这个世界原本没有的东西,是一门非常迷人的学科。”周其林说,他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为学生打开创造世界的大门。

从教:致力于传播“化学之美”

说起周其林与化学的缘分,要把时间回拨至40年前。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时,周其林还是南京农村的一名普通回乡知青,整日所做的,无非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重拾学业,第二年便成为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周其林在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前往德国、瑞士、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年,他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职,到南开大学任教,成为一名化学老师。

从教多年来,周其林曾多次向同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高校里做基础研究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教育和培养学生,而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教师的“初心”。

因此,从到南开之日起,周其林就承担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修课《有机立体化学》(当代

化学前沿)等课程的讲授工作。这些课程是前沿课程,也是基础课程,学习效果的好坏关系学生能否打好科研基础,能否对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能否建立起科学的学习方法。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只有动手实践,方能接近真理。”课堂上,周其林先是通过大班教学让学生了解前沿课题,再要求学生从能源、环境、催化、材料等方向确定兴趣点,查找资料后在小班讲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尽可能在课堂增加互动和学生自主提问环节,不仅给学生以知识,还给学生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科研:为所有学生敞开大门

在南开大学,几乎人人都知道,周其林的课题组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无论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只要对他的研究方向感兴趣,都可以到他的实验室里体验一番。

不过,2003级哲学系学生宋颂却并不想简单地体验,他在大三时就下定决心转入化学系,并在研究生阶段顺利进入周其林课题组。

学化学,兴趣固然重要,但从文科到理科却存在着天然的屏障,如何跨越,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对此,周其林的一贯做法是“愿意为此花上一点时间,一点精力”。

自宋颂转入课题组后,周其林帮他从事最基本的实验操作练习。每次课题组开会,周其林都会总览国外关注宋颂的汇报,并为他“开小灶”。在他的指导下,2014年,宋颂获得天津市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名副教授。

此外,周其林课题组的大门还曾向2011年从北京大学医学部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的陈勇敞开,2014年,他在周其林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并赴奥地利攻读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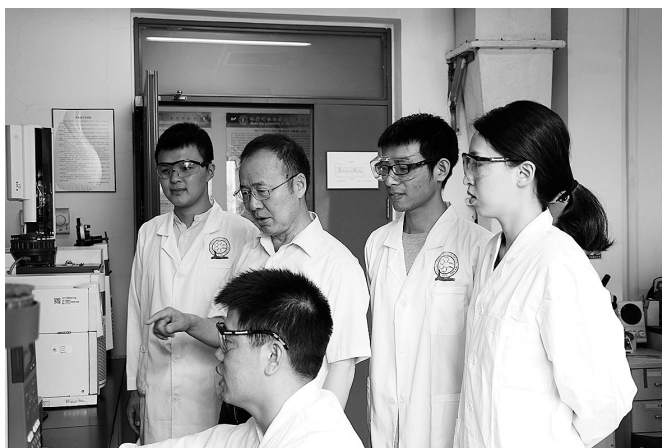
“他们从哲学、英语专业转到化学专业,可见其决心,我没有理由不接收他们。”周其林说,他们只是实验少了些,帮他们补上就是了。

如今,周其林已为国家培养了70余名优秀博士和硕士,他们大多在国内外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制药公司任职,其中有多人获得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为人:像做实验一样守规则

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周其林都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除了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外,他还设计发展了一类全新的手性螺环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等。而在为人上,他也一样令人称赞、佩服。

“周老师实验选题的标准,从来不是‘好发论文’,而是‘学科前沿’和‘国家需要’。”南开大学2014级直博生李茂霖告诉记者。在当前的学术风气下,周其林此举多少有些“另类”。



周其林院士(后排左二)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直到我也成为一名教师,才真正理解周老师的良苦用心。”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朱守非从2000年读研开始进入周其林的课题组,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进入课题组之初,他就发现导师周其林的文章数量并不多。“在‘大咖’云集、同行文章不断的情况下,当时周老师的压力应该也挺大的,但他仍能守住原则,把握节奏,堪称我们后学之人的榜样。”

对于周其林的严格要求、极重规则,南开大学化学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王宸深有感触。

进课题组之初,他半年时间都在做单调的实验操作训练,只是因为周其林的要求——“遵循规则,练好手艺”。

“周老师做人做事都非常遵守规则。”王宸介绍道,比如课题组或者研究所的仪器出现故障,他会要求学生按照研究所的流程报送相关部门检修,而不是用自己“院士”的身份“打个招呼”“说句话”,寻求便利。“周老师常告诉我们,实验要守规则,做人做事也要守规则,如果制度存在漏洞,我们要积极反映,共同完善制度,而不是在制度之外使用‘特权’。”